

红/十/字/文/化/丛/书

池子华 总主编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 抗战救护研究

戴斌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苏州大学 中国史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资助出版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基地)经费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 抗战救护研究

戴斌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红十字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鸿声

主任 严晓凤 王卫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英 王 专 王卫平

王国平 池子华 刘志明

朱从兵 严晓凤 巫 琴

周小蓉 郝如一

主 编 池子华

副 主 编 郝如一 董 娜

执行副主编 郝 珺 郭进萍

总 序

150年前，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旨在促进人类持久和平的红十字运动在欧洲兴起并迅速走向世界。一百多年来，红十字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因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欢迎，已发展成为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的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之一。究其原因，乃其所奉行的七项基本原则——也是红十字文化的内核——涵盖了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点，能为文化和制度不同的国家所接受，故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00年前，红十字运动东渐登陆中国。在其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红十字会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茁壮成长，逐步形成了“人道、博爱、奉献”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

百余年来，红十字运动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经验与教训需要上升为理论；也只有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学界、业界对此都进行了持续的关注。

2005年12月7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与苏州市红十字会携手合作，成立全国首家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旨在通过学界和业界的联合，推动和加强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探究红十字运动中国化的过程与特色，凝练红十字文化价值，探求红十字运动在构建国家软实力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年12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提出，“确定一批研究课题，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及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深入研究”^①。由此，学界、业界共同开展了对红十字运动

^①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的意见》，红总字〔2005〕19号。

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

多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除通过专业网站（<http://www.hszyj.net>）发布和交流学界、业界动态外，已出版研究成果二十余部；帮助一些地方红十字会建立与高校的合作，搭建平台，共同开展研究；举办了首届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红十字运动的生力军；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中心主要研究人员还借助在各地讲学的机会，传播重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理念。正是在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引领之下，红十字运动研究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红学”^①呼之欲出。仅以2011年为例，各地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契机，纷纷整理、编辑出版了地方红会百年史；有的红会还与高校合作组建相关研究中心，等等^②，通过这些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红十字运动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1月7日，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大力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上提出：“要深化理论研究，充分挖掘红十字文化内涵，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广泛传播人道理念，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③红十字“文

① 在2009年4月于苏州大学召开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指出，经过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实践发展和学术界呕心沥血的开拓性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构建一门“新红学”——红十字学，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见池子华：《创建“红十字学”刍议》，《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4月17日。

② 池子华、郝如一：《2011年红十字理论研究之回顾》，《中国红十字报》2012年1月3日。

③ 《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三次理事会召开》，《中国红十字报》2011年12月9日。

化工程”已然成为红十字会总体建设目标之一^①。进一步加强与拓展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尤其是对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研究，已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呼唤。

有鉴于此，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继续发挥高等学校与业界合作的优势，汇聚研究队伍，科学选题，出版一套《红十字文化丛书》，弘扬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思想和精神，凸显红十字文化在中国文化园地中的地位，使红十字文化在神州大地上更加枝繁叶茂，促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红十字文化的国际交流。

《红十字文化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省红十字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市红十字会等单位的鼎力支持，也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关心和指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对于丛书的出版亦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致衷心感谢。

池子华 严晓凤 郝如一

2012年春

^① 池子华：《“文化工程”应成为红十字会总体建设目标之一》，《中国红十字报》2009年12月11日。

<h1>目 录</h1>	
绪 论	(001)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001)
二、研究现状与史料概况	(006)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018)
四、创新与不足	(019)
第一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建	(021)
第一节 全面抗战初期的战地救护概况	(021)
一、华北战场救护	(021)
二、淞沪会战救护	(022)
三、创办南京伤兵医院	(029)
第二节 总会抗战救护策略的调整	(032)
第三节 救护总队的组建及变迁	(036)
一、救护总队的组建	(036)
二、救护总队发展变迁	(039)
第二章 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	(054)
第一节 救护总队的组织结构	(054)
一、战地救护指挥机关	(056)
二、医务执行机构	(057)
三、业务派出机构	(061)
四、业务培训机构	(062)
五、后勤保障机构	(064)
第二节 救护总队的组织运作	(065)

一、经费来源与使用	(065)
二、材料供应与运输	(071)
三、人事管理与身份争取	(076)
第三节 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	(083)
一、战时“三合一”政策的推动	(083)
二、战时“三合一”政策的运作	(091)
三、战时“三合一”政策的贯彻	(108)
第三章 抗战防御阶段的战地救护活动	(126)
第一节 战局变化与战地救护工作的开展	(126)
第二节 徐州会战时期的战地救护工作	(128)
第三节 武汉广州会战时期的战地救护实施	(136)
一、武汉区域	(137)
二、湖南区域	(146)
三、赣浙区域	(150)
四、两广区域	(151)
第四章 抗战相持阶段的救护医疗事业	(154)
第一节 军事演进对战地救护工作的影响	(154)
第二节 救护总队各区域抗战救护实录	(158)
一、晋陕豫区域	(158)
二、川鄂区域	(165)
三、湘赣区域	(170)
四、皖浙苏赣区域	(184)
五、两广区域	(187)
第三节 救护总队抗战救护主要医务措施	(190)
一、实施外科手术	(190)
二、开展卫生防疫	(195)
三、促进环境卫生	(207)
四、注重医护工作	(212)
五、防护化学细菌武器	(217)

第五章 抗战反攻阶段的战地救护作业	(232)
第一节 救护总队战地救护工作剪影	(232)
一、常德会战救护	(232)
二、豫湘桂战役救护	(233)
三、豫南鄂北战役救护	(238)
第二节 九大队与四次湘北会战	(240)
第三节 印缅战场飘扬的红十字旗帜	(256)
结 语	(266)
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88)

绪 论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战争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人类在选择战争的同时，也选择了伤亡和疾病，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从古战场上的刀枪剑戟，到现代战争的飞机、大炮、火箭、核弹、生化武器以及激光微波、次声等新概念武器，战争造成的创伤巨大，花样不断翻新。一旦战争爆发，杀人规模必然越来越大，战地救护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突出。

既然有了战争，必然带来战伤和疾病，从而也产生了对战伤的处理和救助。战争伤病的处理效果会影响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许多带兵打仗的将帅都明白这一道理。他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会注意士卒的健康与伤病，并会采取一些救护措施。《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师前誓师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①齐将军司马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于士卒平分粮食；……兵病者皆求行，争奋为之赴战”^②。可见当时军队已重视对伤病士兵的救护与治疗。而军队中医事组织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还缺乏直接的实证材料。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秣马厉兵，军中出现一些职业的或非职业的游方“疡医”、“方士”和某些尚处雏形的医事组织。三国时期，开始有军医在部队中为士兵疗伤的记载。《三国志·蜀书》载：蜀将关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右臂，后虽创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方除。’羽便伸臂令医劈之……”^③这一手术未说明医者姓

^①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参见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② 《司马穰苴列传》，《史记》卷六四，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2页。

^③ 《关张马黄赵传》，《三国志·蜀书》卷三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总第941页。

名，但关羽刮骨疗毒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文字记载的扩创手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开始记载有医生随军出征，专职治疗战伤的事例^①，但确定有常设的军医机构，则始于唐初所设的“天策上将府”，其中主持医药事务的官员称为功曹、参军事等^②。此后，历朝均有军医职官的设立，尤其是戍边的军队，更是朝廷经常关心的对象。历朝在设置军医职位的同时，也逐步加强战争救护机构与制度的建设，如秦汉对屯戍边防部队的战伤救治工作的加强和对传染病的管理；唐代军营巡视制度和护理制度的建立；五代专职军医的设置；宋代军中医药院的建立；元代政府对伤病死亡军人的抚恤；明代药局的设立等^③。不过，其中有许多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卫生勤务决策却没有得到继承发展，而是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消亡。由此可见，历朝军医的缺乏一直是个问题，跟庞大的军队数目比较起来，军医的数量简直是九牛一毛，再加上军医的派遣有时是临时性质，并未定为常规制度，事过境迁也就不复存在。如清代在成立新军以前，军队中根本无固定的军医名额，遇有将士患病，多系临时奏请派遣。从乾隆以至光绪诸朝，一般高级将领负伤或患病时，如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派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治，或至附近城市与省城就医，籍资坐镇；如病情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调治。至于士兵则仅在夏季及疫病流行时或战时，由太医院配发时症药物及急救药品。其余受伤患病兵丁，战时在营调养，战后则遣回治疗^④。这样，在军队中既没有固定的军医，又无经常的卫生设施，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卫生问题。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无策。因此军队伤亡处理的机制，也始终无法走上轨道。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建立了新式陆军及海军，新式军医制度亦随之建立。在军队中除中医外，也开始任用西医及外籍医生。1856年，清政府任关韬（1818—1874）为军医。关韬曾在博济医院服务多年，是中国人学习西医中较早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赏关韬以五品顶戴，是为清政府军队中任用西医之始^⑤。此后，清政府相继在陆军部及海军部设立军医司，分别专事陆军与海军的卫生、治疗、医药器具及军

① 参见朱克文等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以下简称《中国军事医学史》）

②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36页。

③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3页。

④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88页。

⑤ 李涛：《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编译部1940年版，第23页。

医教育等项事宜，并对禁卫军、北洋常备军及陆军各营医药人员的编制及待遇予以规定^①。从这时开始，中国近代军医制度逐步走上正轨。

中华民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在军医领导机构、部队卫生组织系统及军队医院的建设方面均有所努力。

首先是军医领导机构方面。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由于局面未稳，军事组织机构尚无稳定的领导体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设参谋本部，军医工作归属参谋本部。此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时期，仍沿袭清制，陆军部设军医司。军医司下设卫生、医务、兽医三科，负责管理军医和兽医的各诊疗机关，进行体格检查、伤病诊治、防疫和卫生试验、卫生材料和蹄铁供应，制定战时卫生勤务各项规则，负责军医、司药、兽医等各类人员的勤务教育、考绩和补充、统计和调查，以及指导红十字会和恤兵团体等事项^②。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政部下设陆军署军医司，负责全军卫生行政管理。1929年秋，军医司曾订有《训政时期军医工作分配年表》，分6年（1929—1934）列举每年的工作大纲，“在中央抓卫生人才之培植，卫生材料之制造及卫生常识之灌输，体格检查之实施，专门人才之充实，以及战时卫生事业之准备”，“其中最要最急者为军医兽医教育之改进”^③。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借以协调地方与军队卫生勤务工作。1935年8月1日，该监理委员会与军医司合并改组成军医署，直隶军委会。

其次是部队卫生组织系统方面。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经常混战，财政支绌，军队卫生经费比例很低，尤其是军医人才奇缺，军队中医务设施均甚简陋，根本谈不上有系统的部队卫生组织。经1929年至1936年国民政府数次整军后，部队逐渐形成了各级卫生组织体系，并颁布了一系列军医法规。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军有军医处，师有军医处和师军医院（300床位的）一所，团设卫生队，营设医务所，连有看护兵或担架兵^④。师军医处隶属于师司令部，掌理全师卫生及医药、兽医等事项，其职责包括军队防疫、军队卫生（包括气候、土地、建筑、被

①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89—93页。

②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10页。

③ 《军医司训政时期军医工作分配年表和说明书》，《军医公报》第1期（1929年10月），第45—49页。

④ 参见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史》第3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594页。

服、粮食、给水、排水等)及卫生实验,卫生人员之教育与人事,部队卫生宣传、视察及卫生统计,患者入院、归队、转院及转地疗养,健康检查与征兵检查以及恤赏诊断、除役诊断及裁判鉴定,卫生材料筹备、支配、出纳、稽核、报销和卫生材料之保管、鉴定、整修等事项^①。团医务所由团营医药人员及看护士兵组成,设诊疗、调剂和修养各室,具体组织实施传染病预防、预防接种、卫生讲话、视察营舍、饮食、给排水与各项公共卫生事宜,执行新兵入伍查体与定期的军人健康检查,教育训练看护士兵与担架兵。诊疗室开展门诊,休养室收治所属部队病症较轻者,若入所后经久未愈,则转送医院调治。调剂室负责药品器械之出纳保管、整体调剂,以及食物饮水与毒物之卫生检验^②。

三是军队医院的建设。北洋政府时期,直属陆军部的医院初期仅有陆军军医学校的附属医院和北洋医院,稍后,陆军部曾在军事要冲地筹设陆军医院、陆军残废军人教养院^③。此外,北洋政府在北京曾设行营军医总局和兵站总处,战时在兵站线路内的枢要地开设有兵站医院。兵站医院利用各兵站处附属的卫生人员、红十字会员或调用地方医务人员组成,或直接利用当地慈善会等医院,战争结束即行撤销^④。南京国民政府自1929年起先后在各军事要区,渐次筹设甲、乙种陆军医院。甲、乙种陆军医院的收容量,分别为1000人与500人^⑤。至1929年10月,已设有:首都第一(甲)、第二(乙)陆军医院,和驻杭(甲)、驻湘(长沙、甲)、驻徐州(乙)、驻赣(南昌、乙)、驻鲁(济南、乙)7所陆军医院^⑥。陆军医院设有门诊部与住院部进行各科诊疗,一般区分为内、外两大科,内科设有内科诊疗室、门诊室、传染病室、病理检查室、细菌检查室、X光室等;外科设有外科室、手术室(附消毒室)、眼耳鼻喉科室及绷带室;药局设有调剂室和卫生材料仓库^⑦。1937年抗战开始后,军政部军医署规定了陆军医院、后方医院、兵站医院、伤病官兵收容所、卫生车船队的改组,还组织了手术组、重伤医院及防疫大

① 《师军医处服务暂行规定》,《军医公报》第2期(1929年11月),第9—14页。

② 《团营卫生人员战时卫生服务暂行规定》,《军医公报》第2期(1929年11月),第9—14页。

③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13页。

④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13页。

⑤ 《军医司1929年5月工作概况》,《军医公报》第3期(1929年12月),第73—76页。

⑥ 《军医公报》第2期(1929年11月),第38页。

⑦ 《军医公报》第2期(1929年9月),第11—16页。

队等卫生机构^①。

国民政府军医制度虽有上述的规定组织，但在抗战前则形同虚设，各单位医务人员就其技术教育而言合格者不多，至于医疗设备、器械药材等亦大都阙如^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战区域不断扩大，部队卫生单位随之增多。由于卫生经费、人才、装备的短缺，各级卫生机关的设施，都是因陋就简，与实际战争需要仍有很大距离，是故欲应付当时全面抗战医疗所需，则必须依赖民间力量加以充实，才能增强其工作效能。其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对此作出了相当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与一般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的工作有战地救护的内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支援抗战。国家危难之秋，中国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迅速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但当时中国社会医疗资源贫乏，军医力量薄弱，如要应付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伤亡疾病问题，势必需要将现有医疗资源做有效的整合运用。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并筹组救护总队部，以林可胜为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救护总队乃为“战时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③。救护总队自1938年春正式成立，随即组织了医疗、医防、急救、X光等37队，遍遣全国战区，另设汽车队、材料库分司运输、补给。救护总队的初期工作对象以技术为主，从旁协助各战区兵站的后方卫生机关实施手术、矫治骨折、X光检查、细菌检验、特别营养等。1938年5月因汉口危急，临时救护委员会及救护总队先迁长沙，11月又迁祁阳，最后于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因鉴于军中工作之经验，救护总队深以病兵人数多于伤兵，尤以传染病之流行最为可虑，乃综合医疗、医护、医防、急救各队之性能一律改称为医务队，尽量推进野战区，协助军师卫生机关从事手术绷带急救，并指导办理灭虱、治疥、抗疟、改进环境卫生及兵食营养等军中卫生工作。救护总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由组建初期的37队开始，陆续扩充至178队，医护人员曾达3420人，同时拥有救护汽车200辆，卫生材料分库

① 《中国军事医学史》，第114页。

② 汪凯熙：《记协和同学参加抗战之贡献》，参见刘似锦主编：《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页。

③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红十字月刊》第18期（1947年6月），第6页。

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遂撤离贵阳图云关，在重庆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理难民医疗工作，后又迁回南京。1946年5月，奉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受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的驱动，还是受历史研究学术探讨需要的驱动，与抗日战争历史有关的著述，其中包括历史教科书、历史普及读物、历史研究论述等，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对其他历史进行研究的著述。然而，目前研究抗日战争史学者，大多把研究趣旨聚焦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沦陷区以及中日关系等方面^①，较少留意抗战伤亡疾病的处理问题，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研究，涉足者更是屈指可数。尽管台湾学者张建侗与大陆学者池子华略有论述，但也是作为其研究的“副产品”出现在著作之中。据笔者所知，目前尚无研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相关著作问世，这与其在抗战期间的重要地位实不相符。因此，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进行研究，既可窥视抗战期间伤亡疾病处理的实际状况，又可探讨救护总队抗战救护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此外，还可便于我们总结其战地救护的历史经验，凸显其战地救护对维持抗战力量的意义，还原历史史实，达到战地救护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沟通。此即笔者研究此课题的主要动机。另一动机是出于资料的考量，有关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原始档案资料目前大部分藏于贵阳市档案馆和贵州省档案馆，该处所藏救护总队的档案资料之丰为他处所不及，这为笔者相较其他课题收集资料更为方便。基于以上因素，选取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作为论题，以之为切入口，分析救护总队的组建变迁、组织体系及其战地救护工作等议题，讨论战地救护对减轻伤兵痛苦，维持抗战力量，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为笔者选题的意义。

二、研究现状与史料概况

救护总队作为抗战期间专门的战地救护民间组织，在抗战时期备受国内外关注。但是，目前史学界对其研究却相当薄弱。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界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研究成果只有台湾学者张建侗先生的《抗战时期

^① 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489页。

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①，苏州大学池子华先生所撰写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上）》^②、《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③、《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④，以及笔者撰写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述论——以武汉广州会战为中心》^⑤、《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⑥、《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⑦ 等文章。这些论述揭示了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中相当一部分具体内容，其中各位著者根据自己的整体思路，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给出了比较恰当的评述，为笔者进一步的研究与反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在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的同时，有必要检视一下史学界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整体研究现状，这不仅有助于厘清抗战时期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的一些重要外围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显示了史学界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认知程度。

据笔者所知，民国时期没有学者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抗战前连介绍性的相关作品也很少见。抗战爆发后，因红十字会特殊的国际地位与属性，使得该会特别注重战地救护工作。为了使红十字会更好地配合政府救助伤兵，时任总会秘书长的庞京周在1938年2月发表了《抗战与救护工作》一文，从抗战与救护的关系、抗战中民众应有的救护准备、动员实施救护的管理以及抗战中大众对救护的责任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救助受伤将士，对于“抗战前途、实有莫大利益”，并且强调对战士的救护，“本来是军队前后方卫生勤务人员的责任”，至

① 张建伟：《抗战时期战地救护体系的建构及其运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中心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

②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上）》《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③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下）》《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④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⑤ 戴斌武、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述论——以武汉广州会战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9期。

⑥ 戴斌武：《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⑦ 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见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于红十字会等民众救护团体，应“始终站在辅助的地位”，明确了战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地位^①。一年之后，庞氏出版了《抗战两年中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书。该书重点介绍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两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详细记述了淞沪会战及南京沦陷前后的救护情况，以及总会决定改变救护策略，筹组救护总队部，组织流动医疗队的细节^②。抗战中后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编有《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动向》^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④两种文献，对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战事救护事业的演进、救护工作的成效以及战时红十字会的行政机构作了说明。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此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其自身历史进行梳理，印行了《中国红十字会》^⑤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⑥两本小册子；此外，总会秘书长胡兰生也发表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一文^⑦。这些历史文献涉及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建背景、发展变迁、战地救护、医疗防疫以及工作成绩等方面的基本史实与数据，是笔者研究本课题最基本的历史文献资料。

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中国红十字会史的研究主要是Reeves的博士论文。Reeves的论文共分5章，第一章是叙述甲午战争期间传教士从事有关红十字会活动；第二章是讨论了1899—1900年中国参与海牙会议的经过；第三章是从日俄战争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始，谈到其由地方慈善事业发展到全国慈善团体的过程；第四章以天津、济南等分会为例，叙述分会活动及其与总会的关系；第五章讨论国民政府前十年红十字会活动^⑧。由上述结构可知该论文论述重点略有偏差，如1900年以前篇幅竟占了三分之二；其次，作者对部分中文资料的解读发

① 庞京周：《抗战与救护工作》，（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② 庞京周：《抗战两年中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出版地不详，作者自印，1939年。

③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动向》，（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行1940年版。

④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宣股：《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况》，（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942年版。

⑤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版。（以下简称《中国红十字会》）

⑥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编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1946年内部印行。

⑦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红十字月刊》第18期（1947年6月）。

⑧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Society, 1900—1937*.

P. H. D. Dissertation in the subject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8.